

近代书写语言的形成

—文之类别与复音词

沈 国 威

The formation of modern written language

—Writing categories and polysyllabic words

SHEN Guowei

In his “Wenxue gailiang chuyi” (A tentative proposal for the reform of literature), Hu Shi set forth the necessity to reform both the gist and the form of literature. Thereafter, he recognised the close connection between the reform of literature and that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advancing the proposals of “Jianshe de wenxue geming lun; guoyu de wenxue, wenxue de guoyu” (The theory of a constructive literary revolution: a literature in the national language, a national literary language). Nevertheless, when looking at the history of the *Xixue Dongjian* (The transfer of Western knowledge to the East) from the 16th century onwards, the connections between the Chinese language and the presentation of modern knowledge, i.e. the recounting of science, are broader and more thorough than the contents touched upon by “literature”. A question of the uttermost importance was how to employ the Chinese language to narrate science; after Hu Shi, personalities such as Chen Duxiu, Liu Bannong and Fu Sinian discussed the difference between literary and non-literary writing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anguage form. In this article, the author examines the possibility for the Chinese language to convey modern knowledge at the turn of the 19th and 20th century, what transformations the Chinese language required in order to achieve this purpose and the question of whether the national language dictionary *Ciyuan* prepared the way for it.

Key words: national language; science; literature; spoken language; HU Shi

一 胡适信引出的问题

1916年身在大洋彼岸的胡适致信《新青年》主编陈独秀，讨论文学革命的问题¹⁾。起因是《青年》三号上刊登的谢无量所作长律，并“附有记者按语，推为‘希世之音’”，“子云、相如而后，仅见斯篇，虽工部亦只有此工力，无此佳丽……吾国人伟大精神，犹未丧失也欤”。对此，胡适不以为然地反驳道：“细检谢君此诗，至少凡用古典套语一百事”，“凡人用典或用陈套语者，大抵皆因自己无才力，不能自铸新辞，故用古典套语转一湾子，含糊过去，其避难趋易最可鄙薄”。对于中国文学之现状，胡适接着写道：“综观文学堕落之因，盖可以‘文胜质’一语包之。文胜质者，有形式而无精神，貌似而神亏之谓也”。“欲救此文胜质之弊”，胡适在信中对文学的革命提出了八项主张。列在第一的是“不用典”，至第五项“须讲求文法之结构”均被胡适归入“形式上之革命”，整篇文章的主旨也是攻击陈旧套语，即（文学所用）语言的形式问题。

陈独秀在回应中说：“承示文学革命八事，除五、八二项，其余六事，仆无不合十赞叹，以为今日中国文界之雷音。倘能详其理由，指陈得失，衍为一文，以告当世，其业尤盛，第五项所谓文法之结构者，不知足下所谓文法，将何所指？仆意中国文字，非合音无语尾变化，强律以西洋之Grammar，未免画蛇添足[日本国语，乃合音，惟只动词、形容词，有语尾变化。其他种词，亦强袭西洋文法，颇称附会无实用，况中国文乎？]²⁾若谓为章法语势之结构，汉文亦自有之，此当属诸修辞学，非普通文法。且文学之文与应用之文不同，上未可律以论理学，下未可律以普通文法，其必不可忽视者，修辞学耳。质之足下，以为如何？”就是说，陈认为胡适的所谓“文法”定义含混，如果是西洋的grammar，不讲也好，因为汉语和西方语言各有特点，无须画蛇添足；如果指作文章之法的话，中国古已有之，不过这样的“文法”应该归于修辞学，而不是“论理学”（即逻辑学），这才是文学之文所“必不可忽视者”。陈独秀把文章分为文学之文和应用之文，指出两种文章遵循不同的规则；并请胡适解惑“以上两事，尚望足下有以教之。”

胡适接受了陈独秀“详其理由，指陈得失，衍为一文，以告当世”的建议，遂于1917年1月1日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以下略为《刍议》）。除文章标题由“革命”改为“改

1) 胡适致陈独秀信，《新青年》第2卷第2号，1916年10月1日。

2) 陈文中的“合音”颇为费解，他一方面说“仆意中国文字，非合音”，另一方面又在夹注中说“日本国语乃合音”，把“中国文字”和“日本国语”放在一起讨论。令人难以判断陈氏所说的是文字学层面的问题，还是语言类型学层面的问题，抑或两者兼而有之？日语的假名和印欧语的罗马字母都是表音文字，这是共性。但前者是音节文字，后者是音素文字，性质并不相同。从语言类型学上说，日语为胶着语，只有动词、形容词有屈折变化，其他词类，如名词等则没有。陈批评（一些语法学家）勉强附会英语等的语法分析日语，其实并不实用。而汉语是孤立语，既不使用表音文字，又无屈折变化，所以更不需要套用西文的语法体系。陈独秀的回覆亦载《新青年》第2卷第2号。

良”以外，八项主张的顺序和文字亦有所变动。兹列表对照如下：

表一：文学革命八项主张对照表

| 《致陈独秀信》 | 《文学改良刍议》 |
|---------------------|------------|
| 一曰不用典。 | 一曰须言之有物。 |
| 二曰不用陈套语。 | 二曰不摹仿古人。 |
| 三曰不讲对仗（文当废骈，诗当废律）。 | 三曰须讲求文法。 |
| 四曰不避俗字俗语（不嫌以白话作诗词）。 | 四曰不作无病之呻吟。 |
| 五曰须讲求文法之结构。 | 五曰务去烂调套语。 |
| 六曰不作无病之呻吟。 | 六曰不用典。 |
| 七曰不摹仿古人语，语须有个我在。 | 七曰不讲对仗。 |
| 八曰须言之有物。 | 八曰不避俗字俗语。 |

如上所述，胡适在给陈独秀的信中把“八事”中的第一～五项称之为“形式上之革命”，第六～八项称之为“精神上之革命”，批评的重点是前者。但在《刍议》中，这种形式与内容的分类被打乱了，文章的主旨也随之变得混乱暧昧。

胡适的“文”即“形式”，而这个术语对胡适而言，既有文学形式（genre）的一面，又有语言形式（language form）的一面。如第3项所涉及的骈体文、旧体诗是文学形式；而典、白话、文法等项是语言形式。³⁾这样胡适的“形式上之革命”就包含了对旧文学形式的破除和新语言形式的建构两个方面了。“质”又被胡适称为“精神”，即文学的内容。20世纪第一个十年，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语言最敏感地反映社会的变化。胡适敏锐地认识到当时的旧文学无论是形式还是精神，都无法适应新的社会生活，需要“革命”。即要想改变旧文学，除了内容上的革旧立新外，还需要创建包括语言在内的新形式。

《刍议》发表后所引起了巨大的反响，更多的讨论集中在“不用典”所代表的白话文学和“言文一致”方面。

一年多以后，胡适再次在《新青年》上发表文章“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将“八项主张”，改为“应该做的四条”。在做了铺垫之后，胡适直奔主旨，说：

我的“建设新文学论”的唯一宗旨只有十个大字：“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我们所提唱的文学革命，只是要替中国创造一种国语的文学。有了国语的文学，方才可有文学的国语。有了文学的国语，我们的国语才可算得真正的国语。国语没有文学，便没有生命，便没

3) 其实在当时“文学”一词兼有 literature 和 philology 两种意义。

有价值，便不能成立，便不能发达。⁴⁾

文章题目中的“建设的”，意即“建设性”的。当时的“的”来自日语，是 *tic* 的译词。“国语”与“文言”相对，区别于旧有白话或官话，即新时代的白话。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文学须用国语书写，同时国语也须具有文学性。胡适讨论文学和新时代国语之间的共存共荣关系，他本人其后的学术研究、创作实践的相当部分也正是围绕此两点进行的。但是，纵观16世纪以降的西学东渐史，汉语与近代知识表述，即科学叙述的关系显然要比“文学”涉及的更广泛、更深入。笔者甚至认为先有国语的科学，后有国语的文学；同理，科学的国语先于文学的国语。这样问题就归结于：怎样用汉语讲述科学，这在世纪之交是否可能？汉语如何确立表达的明晰性和逻辑性，并同时成为科学的对象？笔者曾对“讲求文法”“不用典”的问题做过讨论，⁵⁾ 本文将对怎样改造汉语使之适用于科学叙述，以及《辞源》在词语方面的贡献与不足等问题做简略考察。

二 文学之文与应用之文

何谓“文学”？“文学”一词见诸中国古籍，19世纪以后，与西方 *literature* 邂逅，引起诸多讨论。文学应该包括哪些内容，其语言形式有何特点，都是题中应有之义。章太炎说“何以谓之文学？以有文字著於竹帛，故谓之文；论其法式，谓之文学。”，又提出了“文笔”之别：“文即诗赋，笔即公文”，⁶⁾ 侧重于内容形式 (*genre*)。陈独秀则提出了文学之文和应用之文的区别，并指出应用之文必须遵循逻辑学（论理学）和普通文法，修辞学则可忽视。作品与语言形式的关系开始成为讨论的对象。

刘半农针对二人的主张，撰文详论文学与非文学的不同之处。⁷⁾ 刘半农指出：

“文学为美术之一，固已为世界文人所公认”，根据西方的原则，应将一切作品分为文字 (*Language*) 和文学 (*Literature*) 二类。*Language* 的定义是 *Any means of conveying or communicating ideas*。即“文字”只需传达意思，而不需要附加“言外之意”。刘所意识到的似乎是孔子的“辞达而已矣”。另外 *Language* 往往可以和 *Speech* (语言)、*Tongue* (口语) 通用，两者之间并无本质的区别，目的都是把自己的意思传达给其他人。如果说有不同之处，那就是，文字与口语相比可以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正如古语所说“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关于此点，

4) 胡适《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1918.4.15，《新青年》第4卷第4号。

5) 沈国威《“形式”与“精神”的拮抗——重读胡适“文学改良刍议”》，《東アジア文化交渉研究》第6号，2013年43-55页；《旧文学的改良与新国语的建构》，《侨易》第1辑，2014年41-55页。

6) 章太炎《文学总略》，《国学概论·国故论衡》，中华书局2015年，194页；197页。

7) 刘半农《我之文学改良观》，1917.5.1，《新青年》第3卷第3号。

刘的解释已与孔子的原意似有不同, 笔者)。至于 Literature, 西方的定义是 The class of writings distinguished for beauty of style, as poetry, essays, history, fictions, or belles-lettres. 故 Literature 和作为语言代表的文字是有区别的。

这样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文字”和“文学”分别用于什么样的语言行为，以及什么样的作品可以分别称之为“文字”和“文学”？对这两个问题，刘半农是这样回答的：

陈独秀把“文学之文”与“应用之文”对立起来，据此从逻辑上讲，文学之文就不是应用，应用之文也不能视为文学。刘说他不敢苟同陈的主张。西方对于文学功用的定义是：Literature often embraces all compositions except these upon the positive sciences. 这样的定义较之陈独秀的主张稍好，⁸⁾但刘半农认为把“实质科学 (positive sciences)”以外的一切文字，统统纳入文学范围之中也有问题。刘主张凡是科学上的文章，无论是否为 positive (实证)，都应当归入“文字”的范围。至于为什么要加上 positive 的限定，刘半农说，Philosophical Literature 在西方已成为文学中的一种，而哲学又为诸种科学之一，所以必须在“sciences”之上冠以“positive”，这样才能不互相抵触。其实哲学本身，已经包含了高深玄妙的概念，行文当力求浅显，使读者一读即知其意旨所在。刘半农主张无论何种科学皆当归入文字范围、而不当属于文学的范围。也就是说，刘更加重视的是表达、传播上的平易性。他批评中国古代的“科学书”故意为难读者，“务使他人不能明白以为快”。中国原有学术之所以不能发展与普及，或都是因为语言难懂造成的。刘批评严复，其所撰写的《英文汉诂》，虽然内容只不过是粗浅的英文文法而已，但是使用的是古奥、生涩的文言。如果用这本书做教材，学生首先要先学习十几年的古文才行。

对于第二问题，即“文字”和“文学”在写作上有什么不同时，刘半农指出了三点，即：

一、“文字”要讲语法，必要时还要讲逻辑学；“文学”要讲语法，同时也要讲逻辑学和修辞学，不过逻辑学或较轻于修辞学。

二、“文字”无关“精神”，不必矫揉造作；“文学”事关“精神”，作者必须运用语言手段，使自己的意识、情感、心怀包含在文章中。这样的文章才有真正的价值，否则，措辞再好，也只是一大番空话。

三、新时代需要新词语。“文字”中的词语，虽有不雅、不通之处，只要为读者所熟悉就不妨采用；“文学”中的词语，则以漂亮雅洁为要，应该避免杂入累赘费解的新名词。西方的文学中也很少使用学术名词。

继刘半农之后，傅斯年在1918年初以北京大学文科学生的名义发表文章《文学革命申义》。⁹⁾

8) positive sciences 即孔德的 positive stage, 今译“实证科学阶段”。

9) 《文学革命申义》，1918.1.15, 《新青年》第4卷第1号。

对于文学与政治、社会、风俗、学术等的关系，傅氏指出“同探本于一源”，也不同意将文学与其他，尤其是科学对峙起来。他在文章的结尾处写道：

西方学者有言“科学盛而文学衰。”此所谓文学者，古典文学也。人之精力有限，既用其精力于科学，又焉能分神于古典？故科学盛而文学衰者，势也。今后文学既非古典主义，则不但不与科学作反比例，且可与科学作同一方向之消长焉。写实、表象诸派，每利用科学之理，以造其文学，故其精神上之价值有迥非古典文学所能望其肩背者。方今科学输入中国，违反科学之文学，势不能容。利用科学之文学，理必孽育。

一个月后，傅斯年又发表了《文言合一草议》，¹⁰⁾明确提出“与其谓废文词用白话，毋宁谓文言合一，较为愜允。”他一方面强调“废文词而用白话，余所深信而不移也”；另一方面又展现了与胡适、钱玄同等人摒弃文言，改用白话主张的不同之处。他认为他所讲述的用白话是“以白话为本，而取文词所特有者，补苴罅漏，已成统一之器”，就是要取文词所特有的优点来补白话的不足。对于“难者曰，文言合一，自然之趋向，（中略）故作为文言合一之词，但存心乎以白话为素质，以文词上之名词等补其阙失，斯已足矣。制为规条，诚无所用之也”的主张，傅斯年指出，要回答“文言果由何道以合一乎”这个问题，先要辨别文词与言语的特质，取其优而弃其劣，然后再将两者合一。他认为文言合一需要制定若干的规定，并按照规定谨慎行事。

傅斯年臚列了十项“规条”，前4项规定代词、介词、叹词、助词等“全取白话”，因为“此类字在白话中无不足之感”，无须使用文言的遗物。笔者倒是认为上述4项中所涉及的文言虚词实际上并不影响文章的“听懂”，只是给文体的增加了一些陈旧的表面特征而已。第5项傅氏主张一切名词、形容词、动词、副词只要意义不变就用白话代替文言，如食→吃、饮→喝、嬉→玩等。傅说：“吾人聆一俗语，较之聆一同义之文言，心象中较为清楚。”所谓“心象”似可理解为索绪尔的“心理印迹”，或“音响形象”，即语言的声音在我们的头脑中所唤起的概念认知。但需要指出的是，在口语层面，至少在傅文成立的世纪之交，“食、饮、嬉”已经不是词，只是语素了，故无法唤起心象。傅氏的“吾人聆一俗语”的“聆”也是如此，口语中只说“听”（有趣的是，傅斯年在1918年还是用文言写作的，尽管文章的内容是鼓吹白话）。所以这一项目其实并无实际意义，但文白转换是汉语词汇能力的一个重要侧面，¹¹⁾当时的国语课本等都有这方面的训练内容。¹²⁾

10) 傅斯年《文言合一草议》，《新青年》第4卷第2号1918.2.15。

11) 沈国威《汉外词汇教学新探索》，2014年，私家版。

12) 沈国威《关于清学部编〈简易识字课本〉(1909)》，《清代民国汉语研究》，韩国：学古房，2011年209-233页。

第6项讨论的是词语的区别性问题。傅指出了“文词所独具，白话所未有，文词能分别，白话所含混”的现状。在世纪之交，包括来华传教士在内，很多人都认为白话“大体不具”，词汇不及文言丰富。¹³⁾ 汉语的文言以单纯词的形式为事物命名，如“骏、弑、暑”等，词义在白话中都需要用复合词或短语来表达。不用单纯词，采用复合词反映了语言的分析化的趋势，随着五四以后复音词的大量出现，口语词汇辞不达义的情况逐渐解消。¹⁴⁾

第7项极为重要，傅斯年认识到为了实现言文一致，不仅名词（傅在此举的是一般名词的例子，其实学术用语更加重要），动词、形容词、副词也严重不足。傅氏所例示的复音词，如后文所述，大都是五四以后逐渐普及的。傅氏提出“不足，斯以文词益之，无待踌躇也”。补充是当务之急。“以文词益之”云云可知傅斯年所意识到的补充源是古典文献。

第8项，傅氏强调指出“在白话用一字，而文言用二者者，从文词。在文词用一字，而白话用二者者，从白话。”对自己的主张，傅斯年解释道：

中国文字，一字一音，一音一义，而同音之字又多，同音多者，几达百数。因同音字多之故，口说出来，每不易领会，更加一字以助之，听者易解矣。……尽可以一字表之，乃必析为二者，独音故也。然则复词之多，单词之少，出于自然，不因人之好恶。今糅合白话文词，以为一体，因求于口说手写两方，尽属便利。易词言之，手写出来而人能解。口说出来而人能会。如此，则单词必求其少，复词必求其多，方能于诵说之时，使人分晓。故白话用一字，文词用二者者，从文词。白话用二字，文词用一字者，从白话。

也就是说，无论白话还是文言，都要尽量使用复音词。把单音节词改为双音节词，只有这样才能“手写出来而能解，口说出来而人能会”。笔者曾指出现代汉语词汇形成过程中的一个重要步骤是“单双相通”。言文一致首先是科学叙事的问题，而不是文学的问题。小说是用来读（目治）的，而不是听的。课堂上的内容才有必要“听懂”。

傅斯年此文提出了很多重要的观点，从时间上看，某些观点甚至早于胡适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不同的是胡适的重点在于文学的方法，而傅斯年谈的是语言层面上的应对。傅的观点，值得我们加以细致地讨论。

13) 沈国威《西洋人记录的世纪之交的新汉语》，《关西大学东西学术研究所纪要》，第42辑，2009年101-111页。这一问题和近代复音词的发生有关，可参照笔者《我们为什么需要二字词？》，《東アジア文化交渉研究》第10号，2017年101-118页。

14) 还有一种情况是，语言使用者用不同的词表述相同或相近的概念，如，爱人、妻子、拙荆，形成一个由浅及深的次第，深的一侧具有文言的色彩，提供概念义以外的周边义。口语词常常被指没有描写深度。

关于文言与白话的关系，1918年6月，远在美国的朱经农读了胡适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后也给胡适来信，就新文学的载体，即语言的问题，与之商榷。¹⁵⁾朱经农说：

我的意思，并不是反对以白话作文，不过“文学的国语”，对于“文言”、“白话”，应该并采兼收而不偏废。其重要之点，即“文学的国语”并非“白话”，亦非“文言”。须吸收文言之精华，弃却白话的糟粕，另成一种“雅俗共赏”的“活文学”。(中略)我所以大胆说一句：“主张专用文言而排斥白话，或主张专用白话而弃绝文言，都是一偏之见。”

朱也不同意“弃绝文言”，主张“并采兼收”。对于朱经农的意见，胡适回答道：

(所谓的精华、糟粕之类)是狠含糊的话。什么叫做“文言之精华？”什么叫做“白话的糟粕？”这两个名词含混得狠，恐怕老兄自己也难下一个确当的界说。我自己的主张，可用简单的话说明如下：

我所主张的“文学的国语”，即是中国今日比较的最普通的白话。这种国语的语法、文法，全用白话的语法、文法。但随时随地不妨采用文言里两音以上的字。

这种规定——白话的文法，白话的文字，加入文言中可变为白话的文字——可不比“精华”、“糟粕”等等字样明白得多了吗？¹⁶⁾

可知胡适的主张是全面采用白话的句型句式，在此基础上“加入文言中可变为白话的文字（即词）”。胡适的这段话有两层含义，一、复音化为言文一致的新国语所必须，二、文言可以提供部分复音词的资源。那么，文言中哪些“两音以上的字”可以变为白话的词，名动形之中哪种为主，这些词可以从古文献群中手到擒来吗？或者换个角度问，现代汉语中有多少复音词是来自文言的，这是董秀芳所说的“词汇化”的结果，¹⁷⁾还是世纪之交的语言使用者们直接从文言中吸收的？近代以降，中日之间的语言接触，以及知识移动所伴随的词汇交流，对日语、汉语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除了科技术语以外，其他方面的词语是否也存在着某种影响？

三 五四期的语言环境

笔者认为科学叙述需要两方面的词语资源，一是学术用语；二是双音节的谓词，即动词和形

15) 《新青年》，1918.5.15，第5卷第2号。

16) 胡适与朱经农的“通信”，《新青年》，第5卷第2号，1918.8.15。着重号为引用者所加。

17) 董秀芳著《词汇化：汉语双音词的衍生和发展》，北京：商务印书馆，初版2002，修订本2011。

容词，两者缺一不可。学术用语是名词，目的是导入新的概念以及新的意义体系，但构成一个叙述，还需要谓词，即动词和形容词。除了“喻”与“不喻”和文体上的原因以外，由于汉语韵律节奏上的特点，双音节的名词，需要双音节的谓词与之配合。学术用语可以依据术语辞典，而谓词属于一般词语，只能看语文词典。下面我们通过对当时语文学工具书的观察来讨论五四前夜谓词的发育情形。

中国自古以来有“字典”而无“辞典”，作为 dictionary 译词的“辞典”是进入20世纪以后由日语传入汉语的新词。¹⁸⁾ 在日本，18世纪末陆续刊行的几种荷兰语日语双语辞典的正式名称有《译键》(1810)、《和兰字汇》(1858)；其他如“语笈”（《蛮语笈》，箕作阮甫，1848）、“便览”（《三语便览》，村上英俊，1854）；“字类”“字解”（《和兰文典字类》，饭泉士让，1856、《新令字解》，荻田嘯，1866）等也是当时经常用于语文学工具书的名称。“辞书”一词首见于《译键》，是 concordantje（旧拼写法，意为“词汇索引”，=英语 concordance）、woordenschat（意为“词汇”，=英语 stock of words, vocabulary）的译词。1862年堀达之助编纂出版了《英和对译袖珍辞书》，除了书名使用“辞书”以外，书中 dictionary 的译词也采用了“辞书”，这是“dictionary = 辞书”第一次建立对译关系。其后的一段时间里，作为 dictionary 的译词“字汇”与“辞书”长期并存。1878年出版的《日本小辞典》（物集高见编）是第一本以“辞典”命名的工具书，进入20世纪以后，“辞典”逐渐普及并扩散到整个汉字文化圈的国家及地区。现在日语口语中仍然使用“辞书”“字引”等词，但是大型工具书的名称以“辞典”为主。¹⁹⁾

反观中国，1716年《康熙字典》刊行，这是中国辞书史上的一件大事。严复评价道：“中国字书旧矣，自《尔雅》列诸群经，而考者谓为周公之作。降而中车府令之《爰历》。汉人《凡将》、《滂意》，至于洵长《说文》、《五雅》、《三仓》、《玉篇》、《广韵》，代有纂辑，而国朝《康熙字典》，阮氏《经籍纂诂》，集二千余年字书天演之大成，所以著神州同文之盛。”²⁰⁾ 严复在写这段话时，也许还不得不对苟延残喘的清王朝说几句奉承话。数年之后，中华书局在大肆宣传中刊行《中华大字典》（以下根据行文或略为《大字典》）时，林纾已经在毫不顾忌地指陈包括《康熙字典》在内的中国字书的种种缺陷了：“古有广均集均及尔雅说文方言诸书。皆字书也。检之殊难。而寒榭中。又不能遍购。于是（康熙）字典始出。可以按部数画而求索。然实为官书。（中略）顾前清爱

18) 本文使用“辞典”作为 dictionary 的译词，除专有名词外，不使用“词典”。

19) 上述以外的日本近代主要外语辞典类如下：本木正荣等《谙厄利亚语林大成》1814、柴田昌吉·子安峻《附音插图英和字汇》1873、岛田丰《附音插图和译英字汇》1887、棚桥一郎等《韦氏新刊大辞书和译字汇》1888、尺振八《明治英和字典》1889、神田乃武等《模范英和辞典》1911；井上哲次郎《哲学字汇》1881。

20) 严复“英华大辞典序”（1908年，上海商务印书馆），《严复集》第2册，253~254页。

重祖烈。以为书经钦定。无敢斥驳。遂留其讹谬。以病后人。何其悖也”。²¹⁾《康熙字典》尽管存在着种种不足和讹误之处，却“几如金科玉律一字不能改移”，至19、20世纪之交，中国的语文工具书停滞了几近200年。

新概念的导入翻译离不开辞典，16世纪末耶稣会士一踏上中国的土地就开始为编纂辞典做准备，但是并未能实际刊行。²²⁾1807年新教传教士马礼逊(R. Morrison, 1782~1834)来华，他的最大贡献是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编辑出版了3卷6册的《字典》(1815~1823)，开创了系统对译中外概念的先河。马礼逊似乎为dictionary的译词颇费了一番思索，最后他选择了“字典”和“韵府”作为自己那三部六卷辞典的名称。鸦片战争战败，中国被迫打开国门，新教传教士相继来华，事态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西学的引介在知识的深度、广度，乃至受众的规模上都超越了明末清初耶稣会的传教士。到19世纪结束时，出自西人之手，名之为“字典”或“韵府”的双语辞典有数十种之多，中国人独自编写的也有数种。²³⁾但从整体上看，19世纪的英华·华英辞典无论是术语，还是谓词都不足于引介西方的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

四 《辞源》的时代：由字到词

甲午战败是继鸦片战争之后对国人的第二次冲击，救亡和启蒙成了时代的最强音。经由日本的新知识的引介与普及催生了大量的新词语，即“新名词”。语言随时代的变化而变，新学的词语、译词等在200年前的《康熙字典》里自然无处寻觅。既然如此，编写新的辞典也就顺理成章了。20世纪初，在日本英和辞典和各种术语辞典的影响下，中国外语辞典的编纂有了质的飞跃，如《英语大辞典》(颜惠庆主编，1908年初版，商务印书馆)等。这也为汉语语文工具书的编纂做好了准备。促成辞典编纂的另一个原因是新式教科书的大量出版，新式教科书必然需要新的工具书，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这两家教科书的巨头几乎同时开始着手编纂大型语文工具书也恰恰说明了这一点。1912年商务印书馆出版《新字典》，1915年，中华书局推出《中华大字典》。但是“百科之学日新月异”，“字”之典能解决问题吗？

林纾在《中华大字典》“叙一”中写道：随着新知识的传入而出现的新词语中有一些是“近日由东文输入者，前清之诏敕，民国之命令，亦往往采用，旧学者读之，又瞠目不能解。索之(康熙)字典。决不可得。则不能不捨其旧而新是谋矣。”熊希龄在“叙三”中则说“若夫近世新增之

21) 林纾“中华大字典叙一”，《中华大字典》，上海：中华书局，1915年，卷首

22) 有关情况请参见马西尼《早期の宣教師による言語政策：17世紀までの外国人の漢語学習における概況——音声、語彙、文法》，内田庆市·沈国威编《19世紀中国語の諸相》，日本：雄松堂，2007年17-30页；姚小平《早期的汉外字典》，《当代语言学》第9卷2007年第2期97-116页。

23) 沈国威编《近代英华华英辞典解题》，2011年，大阪：关西大学出版部

术语，百科之名词，与夫数百年来俗语之变迁，此皆非求之康熙字典所能得者也。”王宠惠也在“叙六”中指出《康熙字典》的“文学中用字之错误。已成谬种流传。遑论凡百科学之日新月异耶。”新旧语言资源断绝的情况在新学大兴的世纪之交尤为突出。要满足社会的要求，旧有的字典形式显然力不任。严复指出（旧字书）“虽然其书释义定声，类属单行独字，而吾国名物习语，又不可以独字之名尽也，则于是有《佩文韵府》以济其穷。”而西方的“所谓辞典者，于吾字典、韵府二者之制得以合。”²⁴⁾林纾在《中华大字典》“叙一”中说“仆尝谓外国之字典，有括一事为一字者，犹电报中之暗码，但摘一字，而包涵无尽之言。其下加以界说，审其界说，用字不烦，而无所不统，中国则一字但有一义，非联合之不能成文，故翻译西文，往往词费，由无一定之名词，故与西文左也”（下划线为笔者所加，下同）。李家驹也在“叙二”中说“至于学术用语，虽有义可述，然对译一字，畸而不完，必合缀两文，始足一义。若斯之类，字虽固有，谊则新成，自非条举类聚，详为说解不可矣”。为了解消这种缺陷，当时编纂字典的人首先试图在释义上做出改进，加入新的知识，例如“心”字，《新字典》（商务印书馆）和《中华大字典》（中华书局）的释义分别如下：

《新字典》【心】字条

【心】息林切侵韵。脏名。在肺下。中分四房。接动静脉管。为行血之机关者也。图见**【脏】**。古谓心为思虑之官。凡属思虑者皆曰心。今亦以意识之现象。精神之状态。谓之心理。

《中华大字典》【心】字条

【心】思林切音新侵韵

人心土藏。在身之中。象形。博士说以为火藏。见**【说文】**。**【按心者生之本。神之变也。其华在面。其充在血脉。其形类倒悬之椎。长三寸六分。其厚一寸八分。居肺之下。今生理学云。居横隔膜之上。左右两肺之间。形状如囊。为肌肉质。外有膜围绕。名心囊。亦曰心包络。内分上下左右四房。为行血之中枢。】**（附心脏图略）

《新字典》和《大字典》都加入了关于心脏的生理学、解剖学的知识。但需要注意的是字义诠释的改善并不能解决汉语所有的语词问题，因为尽管汉字是汉语的基本单位和成分，但即使是以“字”为对象的工具书也必然面对一个如何对应复辞的问题。《大字典》在凡例规定“以两字或重文成义者。与天象、地理、朝代、国邑、官爵、姓名、动植物、及各科专门名词。均次於单文各义之后”。这较之商务印书馆《新字典》的“为单字之字典。凡两字以上之辞语。非音义有关系

24) 严复《英华大辞典序》，《严复集》第2册，253-254页。

者。概不阑入。以免举一漏百之弊。”是一个实质性的进步。我们可以说《大字典》作为汉语文工具书第一次向西方的 dictionary 那样初步完成了“字典”和“韵府”的融合。《大字典》具体收录多少复辞尚无精确的统计，仅据笔者粗略的翻检发现实际上所收录的新词和各科专门名词有限，不足数百条。²⁵⁾ 这个数量显然太少了，还远远无法满足新学的需要。以至于熊希龄在“叙三”中不客气地指出“康熙字典，与今大字典之作，类不过供文人学士搜检考证之用。”时代更需要的是辞典。

1915年10月上海商务印书馆耗时8年推出中国第一本近代国语辞典《辞源》。²⁶⁾ 如上所述《辞源》开始着手编纂时，汉语发生了自翻译佛经以来的大变局。正如4年后发生的五四运动所象征的那样，新旧文化处于冲撞、搏斗、交替的漩涡之中，是极不安定的过渡期。进入20世纪以后，中国废科举，讲新学，报刊、翻译书籍大量出版，由此引发了为数众多的日语词汇流入汉语，对汉语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变化最明显的莫如文体和词汇，其中新词和各种科技术语的增加是最重要的部分。新语词的急遽增加给社会的口语和书面语言都带来了严重的混乱，引起了语言使用者的不安与反感。²⁷⁾ 例如在京师大学堂接受近代法律教育后留学日本的彭文祖，1915年在东京出版了一本名为《盲人瞎马之新名词》的小册子，对国内译词、术语的混乱和误用大加鞭笞。在词语混乱现象始端倪时，清政府就开始着手术语的厘定工作。1903年并入京师大学堂的同文馆改称译学馆，译学馆内设有文典处，负责术语选定的工作。但是由于缺乏人才，成效甚微。“专科学术名词，非精其学者不能翻译，俟学术大兴，专家奋起，始能议及”。²⁸⁾ 1905年清政府成立学部，1909年学部下设“编订名词馆”，聘严复任总纂。至1912年，该馆厘定了标准科技术语30 000条，供中国的教育机关使用。但是这些被称为“部定”的术语由于政治的和经济上的原因，并没有公之与众，而是为德国人赫美玲所编纂的 English-Chinese Dictionary, 官话 (1916) 所吸收。²⁹⁾ 《辞源》在时间上是可以分享教育部编订名词馆的成果的，但是，实际上其词条更多的是直接取自于日语。商务印书馆毫无疑问认识到了术语的特殊性和重要性，只是基于“吾国编纂辞书，普通必急于专门”（辞源说略）的考虑，才使《辞源》为先。“当《辞源》出版时，公司当局，拟即着手编纂专

25) 其中一个原因是对是否成词的意识古今不同。即使用现在的眼光看是一个复合词的收录单位，其实也只是——一个“字串”。

26) “辞源说略”说，“戊申之春遂决意编纂此书，其初同志五六人，旋增至数十人。（中略）历八年而始竣事”。其实“迨民国初元全稿略具”，而校订等花费了更多的时间。陆尔奎“辞源说略”，《辞源》卷首，1915年。

27) 沈国威，《清末民初《申报》载「新名词」史料（1）》，《或问》第24号，2013年169-180页。

28) 《京师大学堂译学馆章程》第七章文典。张静庐辑注：《中国近代出版史料》二编，上海：中华书局，1954年，26页。

29) 参见沈国威《近代中日词汇交流研究》（中华书局，2010）第四章。赫美玲，Karl E. G. Hemeling, 1898年进中国海关，后任税务司。沈国威《近代日中语汇交流史》，东京：笠间书院1994年，203页。

门辞典二十种，相辅而行。嗣后陆续出版或将近出版者。有人名、地名、动物、植物、哲学、医学、教育、数学、矿物等大辞典”（辞源续编说例）。其中一部分词语汇入了《辞源续编》。中国大规模地编辑出版术语集是在民国20年以后。³⁰⁾《辞源》主编陆尔奎对《辞源》的编纂目的作了如下说明：

癸卯甲辰之际，海上译籍初行，社会口语骤变。报纸鼓吹文明，法学哲理名辞稠迭盈幅。然行之内地，则积极消极内籀外籀皆不知为何语。由是缙绅先生握绝勿观，率以新学相诟病。及游学少年续续返国，欲知国家之掌故，乡土之旧闻。典籍志乘浩如烟海，征文考献，反不如寄居异国，其国之政教礼俗可以展卷即得。由是欲毁弃一切，以言革新，又竟以旧学为迂阔，新旧扞格文化弗进，（下略）³¹⁾

可知，《辞源》的编纂目的首先是为了广大读者学习新知识的需要，同时也是为了保证传统旧学的存续。至19世纪末，每逢科举之年，《康熙字典》销路极好。但是1905年科举制废除，改为“新学取士”；加之翻译书籍的大量出版（主要译自日语），使社会生活中的语词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因此，能涵盖新知识的大型工具书成为全社会的急切需求。当时有数种从日本移植的法律、经济方面的新词辞典、术语辞典，³²⁾但是还没有真正的国语辞典。中华书局更多地强调了对《康熙字典》传统的继承，服务新学没有成为主题，而商务印书馆似乎在《新字典》编纂过程中敏锐地捕捉到时代的先机。商务印书馆汉外辞典类的出版及其商业上的成功，对其做出编纂《辞源》的决定亦有良性的作用。³³⁾

关于《辞源》具体的编纂方针，编者特别意识到了“辞书之与字书”的区别：“积点画以成形体。有音有义者谓之字。用以标识事物。可名可言者谓之辞。古谓一字曰一言。辞书与字书。体用虽异。非二物也。”但是汉语已经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新的概念必须以二字词的形式接受，故有意于新学之人，“凡读书而有疑问。其所指者字也。其所问者皆辞也。故有字书不可无辞书。有单辞不可无复辞。以单字提纲。下列复辞。”单字复辞都收录才是汉语工具书的发展方向。

与《中华大字典》（1915）相比，《辞源》是第一本“辞”的典，这不仅仅是因为《辞源》收录了更多的复辞，而是编纂伊始就明确地有了字典、辞典分工的设想。编纂者有意识地把《辞源》编成一本全新的辞典，《辞源说略》特地指陈了《辞源》与传统的字书的不同之处：

30) 沈国威，《中国近代的科技术语辞典（1858~1949）》，《或问》第13号，2007年137~156页。

31) 陆尔奎“辞源说略”，《辞源》卷首，1915年。

32) 实藤惠秀著《中国人留学日本史》，1970年，谭汝谦等译，香港中文大学，1982年203~213页。

33) 如谢洪赉编《华英音韵字典集成》1902年、颜惠庆编《英华大辞典》，1908年等。

（《辞源》）其旨一以应用，（中略）凡读书而有疑问，其所指者字也，其所问者皆辞也。（中略）故有字书不可无辞书，有单辞不可无复辞。此书仍以《新字典》之单字提纲，下列复辞。虽与《新字典》同一意向，³⁴⁾而于应用上或为较备至，与字书之性质，则迥乎不侔也。

而且“单字提纲，下列复辞”，字辞兼收，一本《辞源》在手同时解决了字和复辞的问题。同时，编纂者也明确地意识到了辞书和类书的区别：

（类书等）重在出处，不重在诠释。（中略）辞书以补助知识为职志，凡成一名辞，为知识所应有，文字所能达者，皆辞书所当载也。举其出处，释其意义，辨其异同，订其讹谬；凡为检查者所欲知皆辞书所当详也。供一般社会之用，非徒为文人学士之用。故其性质适与类书相反。

《辞源》第一次明确地认识到“字”与“辞”、尤其是复合词的不同，认识“字”和知道“辞”的意义是两个不同层面的问题。因此在编纂上《辞源》更加注重词义的诠释，特别是对那些新词和译词，定义详细，自负提供了读者想知道的全方位的知识。《辞源》将编纂、收词方针定为：语词为主，兼收百科。收词范围由成语、典故、章典制度、天文、地理、医卜、星相、人名至算学、物理、化学、数学等近代新学，极为广泛。对此，《辞源》修订版的出版说明（1979）做了如下的回顾：

《辞源》以旧有的字书、韵书、类书为基础，吸收了现代词书的特点；以语词为主，兼收百科；以常见为主，强调实用；结合书证，重在溯源。

《辞源》续编编纂时，对正续编的侧重点做了明确的界定。续编主编方毅在“辞源续编说例”中说：

将正续两编性质比较。一则注重古言。一则广收新名。正书为研究旧学之渊藪。此编为融贯新旧之津梁。正可互救其偏。

其实方毅的这段话只不过反映了续编以新词为主的侧重点而已，正编本身就已经具有了“融

34)《新字典》虽然比较简单却满足了“贩竖妇女”读者层的需要，这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群体。

贯新旧之津梁”的性质了。

《辞源》的刊行昭示了汉语的语文工具书初步完成了近代的转型，并为接踵而来的新文化运动在词汇层面做了必要的准备。考虑到另外一本国语辞典：《辞海》的出版还须等待20年之久，我们就可以知道《辞源》在现代汉语词汇体系形成过程中的举足轻重的作用。《辞源》一方面上溯古语，一方面下接新词，扮演了承前启后的重要角色。《辞源》出版后，有很多学者指出了其古典词语部分的缺点和错误，³⁵⁾但是，关于《辞源》的新词部份，尤其是从近代词汇的发生、流传、借用，以及与现代词汇的关系方面，尚未见有详细的考察。《辞源》编纂的主要动机是要解决清末民初出现的新词问题。《辞源》中收入了大量的人文、自然科学的新词、术语（尤其是后者，如此大规模地收录科技术语，在今天，即使是大型的语文辞典也几乎不可想象），忠实地反映了当时新旧文化在语词上的冲突和竞争；《辞源》作为近代词汇史上的极为重要的资料之一，其所包含的新词问题是不容忽视的。³⁶⁾

《辞源》的一个极为特殊的现象是：标榜“穷源竟委”、“举其出处，释其意义”的《辞源》事实上大量的词、包括义项没有标明出典，没有给出书证。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并非完全由于考证不精。《辞源》的书证采集工作主要使用了中国的传统典籍，而不包括16世纪末来华的耶稣会士们的汉译西书，甚至那些被收入四库全书中的书也没有被利用。³⁷⁾如地理学上的“热带、温带”等五带名词、以及数学、几何学上的一些基本术语等都没有列出书证。至于19世纪以后来华的新教传教士的大量著作、译籍就更不在利用之列了。这不能不说是一个严重的缺陷。但是，我们退一步想，即使这些文献得以利用也无法从根本上改变无“源”之词（以下简称无源词）的存在。因为造成无源词的主要原因是新词和术语，在这方面来华西士的贡献是有限的。《辞源》中的无源词大致有以下几种情形：³⁸⁾

- a) 西洋的人名、地名、机关名、事件名等专有名词。
- b) 外语的音译词。
- c) 科技词汇、术语。在《辞源》中标明：“化学名词”、“物理名词”。但是词的学科分类标注并

35) 田忠侠在他的两本著作《辞源考证》（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社，1988年）、《辞源续考》（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社，1992年）中主要针对改订版的书证、释义等方面的问题做了深入的探讨。

36) 《辞源》改订版的主持人刘叶秋认为：（初版《辞源》中的）有关政治、经济和自然科学的新名词，大都已经陈旧过时，或者解说不免于错误、片面，值得参考的只是字、词、文、史和百科常识等方面的条目（刘叶秋《中国字典史略》，中华书局，1992年，239页）。将《辞源》作为一种实用的工具书来看，刘氏的结论似无可，而今天1915年版《辞源》的价值更多的是在于作为词汇史的资料。

37) 但是这些书已经进入了某些编写人员的视野。如，“乾”字项下有：“乾坤体义，书名。明西洋人利玛窦著。凡二卷。西法曆算之入中国。自此书始。”的记述。遗憾的是《辞源》第三版（2015）依然忽略了这部分文献。

38) 还有一些俗语词、常用词，如“贡生”等科举上的常用词也未明示出典。这些词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之内。

不十分严格，随意性似乎较大。

- d) 其它新词。从词义上看应为近代以后产生的新词、译词。这些词当然在古典文献中找不到出处。
- e) 日语词汇。包括日本的人名、地名、机关名等专有名词、日本的文物制度方面的传统词语和一些新词、译词。这部份词在《辞源》的释义中以“日本語”“日本译名”“日本所制字”等形式标明了与日语词的渊源关系。

上述c、d、e三类词《辞源》正编为4,659条，续编为：5,436条。³⁹⁾ 这些词（10,195条）为科学叙述提供了新概念上的保障。

五 代小结：《辞源》的未竟事业

《辞源》至1949年，正编、续编、正续编合订本合计销售量达到400万册，不但在商业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对现代汉语词汇体系的形成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学术用语的大量收录无疑是《辞源》的最重要的贡献，但是，如上所述，仅有名词，没有谓词还不足于完成科学叙事。笔者曾经指出现代词汇体系的建构有两个主要特征，一、新的概念用双音节词表示，如果新概念是通过翻译导入的，可以说译词必须是二字形式；二、为表示旧有概念的单音节词准备一个（更多的情况下是一组）同义的双音节形式。⁴⁰⁾ 后者笔者称之为“单双相通”的原则。这一原则意味着词汇体系的建构，不仅仅是学术用语的获得，还必须包括科学叙事不可或缺的谓词：二字动词、形容词及区别词。实际情况显示：《辞源》虽然在极大程度上完成了学术用语的导入，但双音节谓词的收录情况并不理想。例如，根据关西大学博士生周菁的调查，1915年的《辞源》里没有收录下列双音节形容词（下线者可初步确认为“和制汉语”）。

安易 安静 異常 偉大 永遠 永久 英明 銳利 圆滑 艷麗 旺盛 橫暴 溫柔
快速 確實 過剩 過敏 頑強 簡潔 頑固 簡捷 簡單 緩慢 簡明 簡約 危險
稀薄 機敏 狹隘 強硬 強韌 凶暴 狂暴 強烈 巨大 空虛 輕易 輕快 輕便
 輕妙 險惡 健康 堅實 嚴肅 健全 光榮 高雅 豪快 宏闊 高貴 高級 豪壯
 荒誕 荒漠 宏範 巧妙 古拙 孤獨 困難 細心 細緻 濕潤 失當 弱小 洒脱

39) 《辞源》正编2,974页，无源词4,655条；续编1,568页，无源词5,436条。平均到每一页上，后者的无源词比率要大大超过前者。如上文所述，这反映了新词增长的迅猛。

40) 沈国威《中国語彙体系的近代化問題——二字語化現象と日本語の影響作用を中心として》、内田庆市編著《周縁アプローチによる東西言語文化接触の研究とアーカイヴスの構築》、关西大学东西学术研究所、2017年15-35页。

醜惡 重厚 重大 周到 柔軟 重要 主要 純潔 純真 純粹 純正 純良 詳細
 熾烈 深刻 真摯 深邃 垂直 崇高 正確 精確 正規 性急 生硬 凄慘 靜肅
 清純 正常 淒絕 清楚 正當 靜謐 切實 尖銳 專橫 纖巧 纖細 纖弱 善良
 莊重 壯烈 俗惡 粗大 率直 粗暴 多感 妥當 單一 單調 忠實 著名 沈鬱
 陳腐 通俗 低級 低俗 低調 低能 低劣 低廉 適宜 適度 適當 特異 獨自
 特殊 獨特 特別 特有 鈍重 濃厚 濃密 薄弱 煩瑣 卑屈 悲愴 美妙 肥沃
 卑猥 貧寒 敏感 貧困 貧弱 複雜 蕪雜 不便 平滑 平靜 平淡 平凡 別個
 偏狹 膨大 豐富 豐滿 豐沃 無限 無用 明快 明確 明晰 明朗 有為 憂鬱
 優雅 雄勁 有勁 優秀 優勢 優良 有力 良好 冷酷 冷靜 冷淡 老練 露骨
矮小 (共18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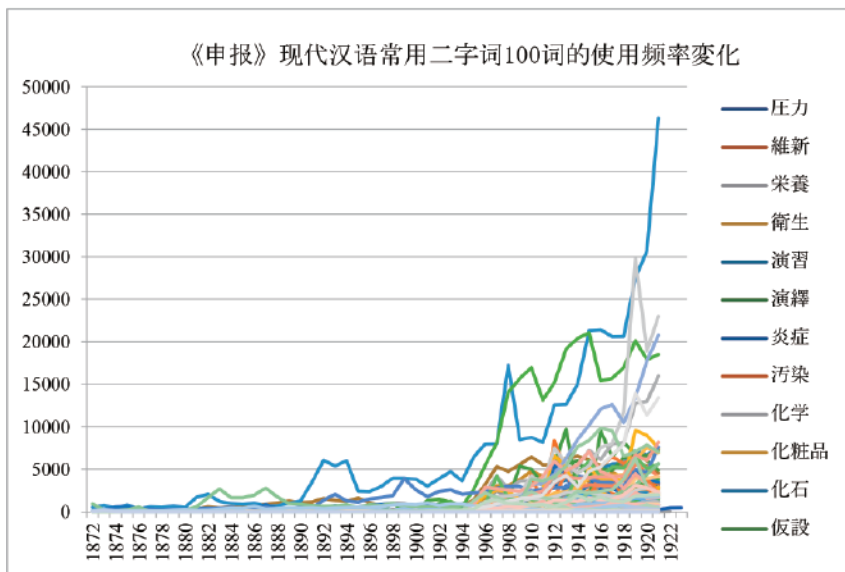
现代汉语中常用的大量的双音节动词的情况比形容词要好一些。根据关西大学硕士生杨驰的调查，现代汉语常用复音词2,600条中，只有1,210条《辞源》初版不收。包括下列“和制汉语”35条：

加热 解约 回收 感光 换算 竞技 交配 公转 航行 座谈 参看 受粉 出勤
 巡航 上映 性交 租借 送达 对应 胎动 代用 脱脂 脱水 锻造 断交 着装
 听诊 传动 反证 放映 防疫 脉动 默读 目测 冷藏

虽然有近1,400条被收入，但存在着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即，对词义的新变化描写不足，即《辞源》还没有完全反映出词的新旧交替和词义的更新。例如下列92条发生词义变化（包括词义扩张和完全改变）的词，只有“同情”“同意”等少数词条的释义对新义有所涉及。

下降 下马 会见 解冻 回归 改善 开业 开放 唤起 感受 贯彻 寄托 逆转
 逆流 倾注 激变 结束 耕耘 合流 告白 再见 收获 出马 酿造 正视 声援
 绝缘 宣传 早退 铸造 挑战 追尾 派生 发现 发行 武装 分流 奋斗 并行
 鞭挞 礼赞 连载 论战 胶着 音译 下达 加入 家居 解体 开演 开场 完成
 观光 观照 检修 贡献 参观 产生 赞同 伺候 社交 重合 出生 出席 出发
 胜利 升华 照会 推进 推理 崇拜 成立 摄取 操作 妥协 代替 弹奏 着眼
 同意 同情 内服 配合 反应 反对 美化 服用 编修 补给 报偿 报复 铭记
 留任

通过对《申报》《大公报》等的抽样调查，我们发现大量双音节词使用频率的提升是在1904年以后的10年间。下图的频率曲线反映了这一点。当然，辞典不可能显示词的普及和定型，但这种词频的变化无疑需要我们加以阐释。近代以降，中日之间的语言接触，以及知识移动所伴随的词汇交流，对日语、汉语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除了科技术语以外，其他方面的词汇影响是否存在？复音化引起的同义词词群的发育和基础词化的现象也需加以记述。⁴¹⁾而这些正是笔者当前全力以赴的课题。



提要 胡适在《文学改良刍议》中提出要在精神上、形式上对文学进行改良。其后胡适又认识到文学的改良与汉语的改革密切相关，提出了“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主张。但是，纵观16世纪以降的西学东渐史，汉语与近代知识表述，即科学叙述的关系显然要比“文学”所涉及的内容更广泛、更深入。至为重要的是如何用汉语进行科学叙事。在胡适之后，陈独秀、刘半农、傅斯年等人从语言形式的角度，对文学之文和非文学之文的区别进行了讨论。本文探讨了19、20世纪之交汉语传递近代知识的可能性，以及为达此目的，需要对汉语做何种改造，国语辞典《辞源》是否为此做好了准备？

关键词 国语 科学 文学 白话 胡适

41) 所谓“基本词化”，即近代以后形成的同义词群中，原来使用频率并不高的词逐渐占据中心位置，成为该词群的代表词的现象。